

爱国人士

王家楨

《田中奏折》的历史见证人



高殿芳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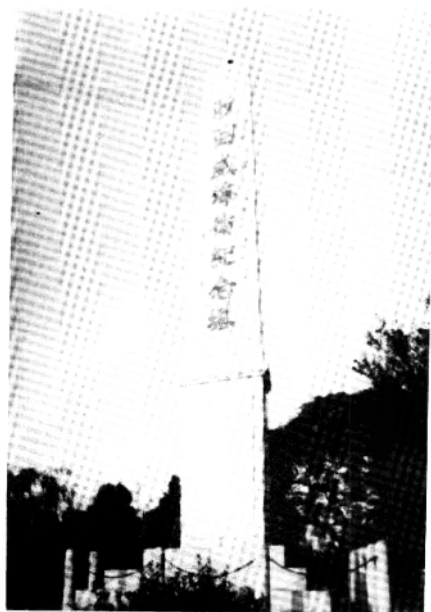


1930 年任职国民党南京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

给王家楨的蔡智堪（一八八八—一九五五）
当在日本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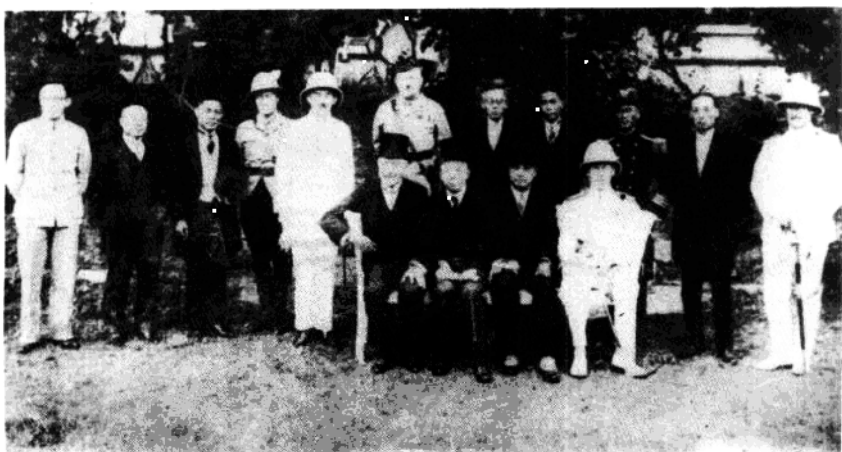


收回威海卫纪念碑（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





1930年10月1日王家桢专员代表国民党政府接收威海卫——中国第一个殖民租界地回归祖国。抵达时英国威海卫办事长官庄士敦欢迎时摄影(左二为王家桢、右二为庄士敦)



接收威海卫仪式后留影(前坐右二为王家桢)



一九五六年王家桢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



1976年王家桢国内子女欢聚照

后一：二婿吴钟浩 长子应先 次子应楠 三子应哲 三媳张之玫
 后二：长孙欣欣 三女菊滨 二媳梁思莹 二女菊凝 外孙女吴虹 外孙吴劲松
 前排：外孙女赵捷 婢母白福茹 妻李明儒 王家桢 孙女咏梅
 前站：孙女晋梅 次孙帆船

序 言

1997年3月19日是爱国人士王家桢先生(1897~1984)100周年诞辰。他的子女为景仰、怀念、报答先父养育之恩,继承其遗志,不懈努力实现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统一祖国,把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未竟大业的宏愿,委托我编辑一部王家桢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集资出版,以慰先父在天之灵,把他一生公正行为、可敬事迹留给世人。受此重托,盛情难却,我边搜集王家桢先生的遗著,边恭请王老先生生前亲人、朋友、同事先后撰写纪念文稿。为慎重起见,我先后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四局、山东威海、辽宁档案馆查阅档案和史料并根据王老先生1983年、1984年与我七次谈话纪录、录音编成《王家桢简历》附于书前。

现将上述各项汇集成册,定名《爱国人士王家桢——〈田中奏折〉的历史见证人》,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书内所载王家桢先生的遗著、有关纪念文章和《简

历》，从不同侧面、全方位、多层次再现了王家桢先生的爱国风范和民族气节以及他的家世、思想、言论和社会活动方方面面的具体表现。

王家桢先生作为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爱国人士，从头角峥嵘到耄耋之年，一生抱着孜孜追求实现祖国统一的远大理想。随着不断实践，他审时度势，分析比较，扩大了视野，提高了认识，受到中国共产党统一祖国大业的感染，果断决定，在共产党领导下，自觉投入全国人民竭力统一祖国的广泛行列，因此，他一生所追求的崇高理想，即指日可待了！

王家桢先生动不失时，在逆境中崛起，垂老不改初衷，投入人民行列以后，一改故辙，一新面目。他的所做所为，寻踪觅迹，有案可稽，凿凿有据，自有公论：“王家桢先生是一位有民族气节、为国为民做出贡献的爱国人士”。他对这一荣誉是当之无愧的！这是王家桢先生子女和编者编辑此书贡献给广大读者的愿望和目的。

王家桢先生的子女集资编辑出版此书的这一举动一再得到民革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对此深表谢意。

高殿芳识于 1996 年 12 月 1 日

目 录

王家桢简历	(2)
我们的父亲	(13)
王家桢遗作	
日本鼓动东北独立的阴谋	(21)
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	(31)
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	(37)
收回威海卫英租地历见记	(54)
王家桢致大女儿王素梅的信	
(1980年5月28日)	(59)
王家桢致蔡智堪的最后一封信	
(1947年6月3日)	(62)
纪念文章	
王家桢与《田中奏折》	高殿芳(67)
王家桢和我	宁恩承(89)
蔡智堪与王家桢	蔡咸源(109)
怀念王家桢同志	傅元庆(115)
编后记	(121)

王家桢简历

王家桢简历

(1897. 3. 19~1984. 12. 28)

王家桢,字树人,黑龙江省双城县人。其先祖在清崇德年间(1636~1643)随清廷所设之八旗汉军,俗称汉军八旗,由山东省文登(今文登市,原文登县)迁黑,前后几代就延续生息、劳动、奋战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因此王家桢本人及其子孙,一直保持着山东人固有的憨厚耿直的倔强性格和朴实坚毅的优良作风。

王家桢幼年、少年时期在家乡读完小学、中学。1917年考取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庆应大学政治经济系。在1917~1924年的8年期间,他除了坚持本学科的专业学习外,还积极参加了旅日华工的救济工作。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爱国先驱之一的王希天(1896~1923),在留学日本期间,辍学投身于旅日华工救济事业。1922年9月

* 王氏简历中的家世、各项职务和引证是根据其档案,出席“国联”理事会、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应美之邀所谈如何对待日俘、天皇制、保存东北工厂问题、《田中奏折》的来龙去脉、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到周恩来总理赞许等问题都是参照有关史料、王氏的遗著和1983年1984年与本人七次谈话记录、录音,经过筛选考证,综合整理而成,特此说明。

编者高殿芳记于1996年12月1日

21日与王家桢、邓洁民、王朴山、孙宗尧几位亲密同学创办了中华旅日华工共济会(又称中华旅日共济会或中华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一致推举王希天为会长(或称委员长),王家桢为副会长(或称副委员长)兼经济部长,两位王氏一时成为旅日华工的领袖人物。1923年9月12日,王希天在东京大地震中救助遇难华工时被日本军警逮捕,惨遭杀害。同年11月30日,王正廷作为专使和团长,沈其昌为副团长率团赴日考察在地震中华工和留学生遇难、日本军警屠杀中国人和王希天被害等事件。王家桢受中国驻日公使馆的委托,担任中国代表团的向导与翻译的任务,偕同代表团进行了一系列活动,组织有序,言行有节,温文尔雅,充满了情深意切的精神,因而得到王正廷的赏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0年5月,王家桢受命担任南京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作了王正廷的得力助手,无不与此有着直接因缘。王家桢还曾连续担任留日学生会的负责人,多次参加和组织了我国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且长期担任中国驻日公使馆的额外专员,代表中国驻日公使馆经常列席日本贵族院的例会,通晓日本皇室内幕,对日本的大陆政策的来龙去脉甚有研究,素有“日本通”之誉。

1924年留学日本结束,从庆应大学毕业后回国,经王正廷的推荐投奔坐镇洛阳的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吴佩孚(1874~1939)担任了吴的外交秘书。同年,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南逃。1926年,吴佩孚在湖南、湖北一带被北伐军打垮,惨遭失败。王家桢在与吴相处

的两年中，深刻地了解到吴是无能之辈，没有任何科学知识，语无伦次，待人无礼，拥有大量军队和霸点，耀武扬威，为害人民，胸无大志，指挥无能，使王家桢回国后追求统一祖国的远大理想大失所望。

1927 年秋，正在犹豫不决，走投无路之际，不料巧遇良机，从洛阳到了北京便由当时“兴安垦屯军”司令邹作华介绍拜见了爱国将军张学良。双方一见如故，张学良快人快语，谈得很投机，没说几句话，当机立断，就任命王家桢为其所属 3 军团少将衔参议，并推荐王家桢为北洋政府国务院金事和外交部四局的科长。在会见王家桢之前，张学良已阅读过王所撰写刊于东北报刊上有关政治经济问题的文章，既知其名，又见其人，如鱼得水，喜招良才。张学良在掌握东北政权初期，求治求贤的心绪非常殷切，他重用年青有为的王家桢协助他办理外交事宜，特别是办理复杂的中日关系方面的外交事宜就是一个显例。

1928 年 8 月，王家桢被任命为张学良将军领导的“东北保安总司令部”（设于原大帅府旧址）外交秘书办公室主任。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对日外交事宜，搜集日本对华政策，特别是日本对东北政策的有关情报，经常翻译、整理日本报刊的有关文章。办公室成员都懂日文，大多数都是留日学生出身。资历较深的秘书陶尚铭、杜重远、陈曙升、宁恩承等人及其他工作人员共计 20 余人从事上述工作和其他各项外事活动。从历史观点来看，外交秘书办公室翻译现代中日关系史上一项公

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一大揭露的绝密文件《田中奏折》，是它的最大成就，也是王家桢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一大贡献（详见后述）。

同年秋，在东北易帜问题正欲解决尚未最后解决之际，日本昭和天皇裕仁举行即位大典，张学良将军借此机会，决定指派莫德惠和王家桢为正、副专使，在蔡公智秘书、安祥科长陪同下径赴日本东京转往举行即位大典的陪都京都表示祝贺。在抵达京都的翌日晚，王家桢、莫德惠同田中义一（1864～1929）就日本与东北的政治关系、东北的地位、张学良将军的前途等重大问题以及具体的铁路交涉、国际局势问题长谈了4个多小时。田中义一再作了很多威胁性的表示，他曾扬言：“我们大和民族是优秀而有志的民族，为了日满（指满蒙，即我国东北——编注）伟大前途，我衷心希望张学良将军能当机立断，深谋远虑，为自己前途着想。至于我们，不管事态怎样演变，我们的政策是钢铁般的坚定不移的！”王家桢出于追求祖国统一的爱国思想，对田中的威胁和诱惑丝毫没有动摇，斩钉截铁地当即表明了张学良将军维护祖国统一和保家卫国的严正立场，使田中义一怒而不言，不欢而散。王家桢在协助张学良将军办理对日外交的整个时期（1927年秋～1930年春）共访问日本三次，这是第一次。关于此次访日的详情，王家桢撰写了《日本鼓动东北独立的阴谋》专文。

在王家桢担任外交秘书主任期间的1928年年尾（应为8月——编注）前后，经过多方联系亲自收到日本

东京的中国爱国人士蔡智堪(1888~1955)从日本皇室书库抄取而来的绝密文件《田中奏折》日文原本。他立即组织翻译、校审、印刷成册并转交南京政府,从此王家桢与《田中奏折》结下了不解之缘。1929年12月,南京政府以外交白皮书的名义在《时事月报》公布了《田中奏折》。从此以后,《田中奏折》在我国和全世界广为传播,轰动了当时国内外的舆论界、外交界以及民间各界,全面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沉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也广泛博得全世界各界对我国深切的同情和大力支持,而且《田中奏折》成了很多论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章和著作的经常援引的重要文件之一。从上述的事实可以看出,王家桢亲自组织翻译、校审并把《田中奏折》公布于世,是他的一大功绩。王家桢为此撰写了《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专文。

1929年年底,王家桢最后一次访问了日本。其目的是商讨张学良将军秘密决定帮助政友本党竞选问题,因此王家桢会见了日本当时政党政治中一名反对田中义一的非常活跃的政客——床次竹二郎,密谈了有关问题后回到了东北沈阳,立即向张学良汇报了密谈结果。在协助张学良将军办理对日外交中的诸如皇姑屯炸车案的追究责任问题、东北易帜问题、吉会铁路草约的交涉问题、撤换东北军的日本顾问问题、枪决杨宇霆、常荫槐防止日本干涉问题和帮助日本政友本党竞选等重大问题上,王家桢都是根据张学良将军所确定的原则,视机而动,出谋划策,以他已有的外交才能,始终协助张学良

将军正当地处理了上述非常复杂而又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坚持了爱国主义的立场，为争取祖国统一，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正由于妥善处理了这些重大事件之后，东北政治空气大变，张学良的政治威信空前提高，事无掣肘，人心一致，充分收到和发扬了求治求贤的效果，这也是王家桢一生中贡献最大的一段不可磨灭的光荣历史。王家桢曾撰写了《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专文，详述了张学良枪决杨宇霆、常荫槐和收买日本政友本党的经过。

1930年5月，王家桢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外交部政务次长，作为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得力副手开展外交活动，侧重办理对日外交事宜。9月23日，国民政府任命王家桢为接收威海卫专使。10月1日，王家桢率海军陆战队官兵300人，乘舰由青岛直达威海，当日10时50分举行了中英交收威海卫典礼。王家桢确切处理了这一重大事件，把1898年被英国强行租占的威海这一北方良港和重要海军基地刘公岛收回祖国的怀抱。为纪念这一活动，王家桢撰写《收回威海卫英租地历见记》专文记述了这一事件的历程，以飨国人。从此以后，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因王家桢在此留下了遗迹，凡威海有重大活动，他均应邀参加，以资纪念往事，对他表示敬意。凡是知道王家桢把威海从英国手中接收过来，投到祖国怀抱的老年人都一再追述说，我们威海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我们将永远怀念着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家桢奉派为中国出

席日内瓦国联会议的代表，陪同首席代表、著名外交家颜惠庆(1877~1950)与另一外交家顾维钧先后同日本外交代表松冈洋右等人就《田中奏折》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颜惠庆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理有据地详述了《田中奏折》的来龙去脉。他的精采发言博得全场记者的热烈掌声和确切好评，对日本侵略者真面目也是彻底地揭穿和愤怒地谴责。会后，王家桢受命在欧美考察了中国驻外几十个使馆的工作和外交活动直到1934年回国。王家桢为此撰写了《欧美环游印象记》一部小册子。书中既记述了驻外使馆的外交活动，也讲述了《田中奏折》的有关问题。遗憾的是这一专著已经失落，无影无踪。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直到1942年7月，王家桢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顾问、国民参政会第1、2、3、4届参政员、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副秘书长、“康昌旅行团”团长等职。1943年3月，曾任财政部火柴专卖公司董事。1943年8月~1944年，继续担任外交部顾问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事专门委员会会员、民生主义经济学社理事。

1944年4月~1945年10月，王家桢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前往美国旧金山商谈创建联合国并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此期间，曾与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首创人之一的董必武(1885~1975)建立了联系，开创了彼此间友谊桥梁。会后，王家桢继续留在美国从事收复东北地区的外交活动。在此空闲时机，应美国国务

院之邀请，王家桢为美国出征军官作了一次报告，一是分析了日本军队的特质，着重讲述了如何对待日军俘虏问题；一是进述了日本天皇制和天皇拥有的权威问题。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1880～1964）曾断言：“天皇胜过20个机械化师的战斗力量”。这既是麦克阿瑟统管日本多年的经验总结，也是美国对日本天皇制认识的集中反映。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0月中旬，王家桢从美国直飞重庆，并立即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接收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先生，并当即作为委员于10月30日飞回长春。不久王又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1946年王家桢担任了东北行营政务委员会常委兼东北九省生产管理局局长。1946年4月18日～5月18日，四平保卫战时，东北行辕主任陈诚（1896～1965）曾通过彭济群通令王家桢，凡撤退地方的工厂必需一律破坏。王家桢出于关心人民疾苦，不犯滔天之罪，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一笔可心如意记录的心迹，反而召集各分局负责人，告诫他们负责组织保护工厂，不得破坏。四平全城解放后，王家桢主持的生产管理局能够完善地清点后转交我军政有关负责机构。这是王家桢本人的一大“自慰”，也是他对人民立下的可以称赞的一大功勋。1947年当选为伪国大代表，1948年弃逆归顺，明目达聪的王家桢已经是“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的心境了。

1948年末，王家桢坚决抗拒国民党政府逼迫他逃